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 刘启良 ●

大理论问题，
学林出版社

学林文库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刘启良·学林出版社



学林文库



(沪)新登字113号

责任编辑:张建一

封面设计:周剑峰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刘启良著

学林出版社 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天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0.25 插页4 字数237,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616-063-9/A·1

定价 14.00元

“学林文库”出版前言

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学术的传统。历代学人殚思竭虑、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各种学术著作，主要借助于出版物这一媒介而播及四方，传之久远。除了偶然的例外，一般来说，只有治学严谨的学者倾全力于其中的学术著作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淘汰而巍然屹立，并且历久而弥新，在丰富的中国文化历史宝库中牢牢地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经济大潮涌动的当今世界，甘于清贫、孜孜矻矻致力于编撰高质量学术著作的学者，是中华学术界的栋梁。他们身上，寄托了中国学术的未来和希望。支持他们的研究和编撰工作并尽量及时将他们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出版物的形式推向读者，推向社会，是每一个有良心的出版家的责任。学林出版社历来以出版高质量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为己任，对此更是义不容辞，更要知难而上。因此，我们决定推出“学林文库”。

“学林文库”的目标是“追求一流”：收入其中的应是中国当代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它们的作者可以是公认的一流的专家、学者，也可以是脱颖而出的顶尖的学术新人，但是他们的著作绝对应是学界和读者公认的一流佳作，应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传之久远的不朽之作。为保证质量，我们采取宁缺勿滥的从严方针，一方面，尽量从我社已出版的高质量学术著作中择优选收经过考验的佳作，以重版的方式列入“文库”；另一方面，我们将在初版书稿中挑选在某一领域具有开拓意义、经过高级专家严格把关、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的上乘之作列入“文库”。为使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我们在“文库”的装帧设计、印制用纸等方面也要在尽量照顾国情的同时，争取与国际接轨，努力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做到赏心悦目，人见人爱。

我们盼望有志气的作者与我们愉快合作，盼望广大读者给予理解和支持，使我们有条件把“学林文库”越办越好。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
究课题和国家教委“八五”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目 录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1
一 “晚年马克思”的发现	1
二 对“晚年马克思”的研究	6
三 晚年马克思和他的东方社会理论	12
四 新的理论难题	21
第二章 历史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研究	28
一 马克思与历史主义传统	28
二 唯物史观：“唯物的”加“历史的”	38
三 青年马克思的历史研究	49
四 中年马克思的历史研究	54
五 晚年马克思的历史研究	66
第三章 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中的几个问题	90
一 关于人类历史分期的哲学思考	90
二 三形态，还是五形态	103
三 “奴隶制社会”说质疑	140
第四章 揭开“亚细亚生产方式”之谜	169
一 回顾中的思考	169

二	我所理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200
三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奴隶制	227
四	马克思晚年是否放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231
第五章	马克思与东方专制主义理论	245
一	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西方渊源	245
二	马克思论东方专制主义	259
三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批判	273
第六章	马克思晚年探索与俄国道路	287
一	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潮”	287
二	俄国民粹派与马克思晚年探索	299
三	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如何可能	307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一、“晚年马克思”的被发现

马克思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之辛劳和战斗的目标只有一个：解放全人类。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马克思被誉为“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于人类的解放大业，马克思的贡献是双重的。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葬仪》中所说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科学巨匠”。不论是理论上的著述，还是亲身的革命斗争实践，他总是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①但我们也不难看到，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的斗争方式是有所倚重的。具体说就是：每当实际的斗争需要他站在社会舞台的前列时，马克思总是像一位无畏的战士同黑暗势力作正面的交锋；而每当斗争事业需要他从理论上作出回答时，马克思又常常一头扎进书堆里，从事艰辛的理论探索。对这后一种倚重，马克思自己称作“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②

我们发现，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 1843 年。由于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就“林木盗

窃案”和“摩塞尔地区贫民状态”等问题同官方的论战，马克思深感到要说明国家的本质问题，首先必须注重对世俗历史的研究，用世俗人的眼光来考察国家。退出《莱茵报》之后，他在克罗茨纳赫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学著作，尤其注重对财产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研究，写下了五本读书笔记。这就是关于历史学的《克罗茨纳赫笔记》。

第二次是在 1849 年下半年至六十年代初。1848—1849 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惨重教训，使马克思感到，制定空想的暴动计划是无济于事的，当务之急是锻造新的思想武器，从而在新的思想武装下，创立一个能够领导一场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他看来，既然在此之前，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已经找到，现在的问题就是要从政治经济学的领域论证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为此，马克思一有时间就埋头于书本，阅读了大量的报纸、专业杂志、官方公报、议会记录、各式各样的统计材料，以及历代的经济学和历史学著作，同时阅读了有关东方社会的材料，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第三次是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直至 1883 年逝世。在这大约十余年时间里，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材料和社会史著作，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即我们今天所称的“人类学笔记”。

按照马克思学习和工作的习惯，他“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也就预示着新的理论著作遂将从他的书房里诞生。第一次“退回书房”，紧接着他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著作，创立了唯物史观。第二次“退回书房”，又写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并完成了他的第二个伟大的发现——剩余价值学说。然而，马克思第三次“退回书房”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前后达十余年之久，除《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第

十章外，并没有写出更多的理论性著作，也没有过什么公之于世的理论发现。而且，对于他自己本想集中精力写作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晚年亦是时断时续，一拖再拖，直到临死前也没有最后完成。

这种情况，很容易在人们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马克思晚年已经无甚作为，比起他的中青年时代来，逊色许多。虽然恩格斯说，直到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马克思才停止思想，但在将近一个世纪里，人们回顾马克思或研究马克思，往往把其晚年当作憾叹之事一笔略过。梅林说：正当政治地平线上到处豁然开朗的时刻，暮色却日益逼近马克思本人和他的家庭，他的旧病复发了，从1878年起，他就没有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写作。梅林还引证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燕妮逝世的那天所说的一句话——“摩尔也死了”——来支持自己的看法。^③本世纪二十年代，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甚至把晚年的马克思说成是“处于慢性死亡的过程”，原因是妻子和女儿的接连离世使马克思陷入了沉重的悲伤之中而难以重新振作。^④

为什么晚年马克思被人们所忽视？我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到过的，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都是完成于他的中青年时代，相比之下，晚年的著述要少得多。

第二，马克思逝世前的几年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以为马克思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上面。当马克思留下没有完成的《资本论》辞世而去时，他们很难在《资本论》之外，看到马克思新的思想路径。

第三，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清理马克思的遗稿时，虽然

发现了马克思晚年所写下的读书笔记，* 但由于他当时所关心的是如何应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请求尽快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整理出版，因而也就忽视了对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其他文字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第四，马克思的字历来写得很潦草，尤其是作读书笔记，更是潦草得使人难以辨认。按照克拉德的说法，马克思晚年留下来的笔记，“除了给自己看以外，他是不打算给任何人看的。”^⑤这样，也就为人们认识其中所蕴涵的思想价值带来了困难。

第五，马克思晚年从事人类学和古代史研究，思想意图并不为其他人所了解，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恩格斯也不大清楚。恩格斯后来回忆说：马克思晚年“总是瞒着我们不讲他的工作情况。他明白，我们要是知道他写好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同他纠缠不清，直到他同意发表为止。”^⑥马克思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只要他的理论研究尚处在仍需探索的阶段，他是不会轻易地把它写成正式作品的，更不会轻易地拿出来发表。在他看来，“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碍的”。^⑦也正因为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晚年的工作情况不完全了解，所以也就都误以为他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资本论》的写作上面。

第六，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前后，曾多次强调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贡献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我们知道，马克思这“两大发现”均完成于他的中青年时代。这样，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马克思一生最有思想成就的时期是完成两大发现的中青年时代，而晚年由于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发现，相比之下，也就自然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 现存的马克思的笔记本上有另一个人编的索引，从字迹上看，这个人就是恩格斯。

真正发现“晚年马克思”的是本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

马克思晚年所留下来的大量的人类学笔记原件，在西方几经辗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保存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史研究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克拉德在这里作了几年时间的潜心研究。1972年，他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书名出版了马克思晚年四个重要的人类学笔记，即《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和《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尔后不久，克拉德又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另一部读书笔记，即《马·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这五个笔记共208页（八开本）约合中文40万字，虽在马克思晚年大量的读书笔记中仅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其内容却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晚年的笔记并不是到了克拉德手里才第一次公开出版，更不是在此之前就无人知晓。早在二十年代，梁赞诺夫就曾把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复制品”带到苏联。但由于苏联理论界对其中的思想价值估计不足，以致这些笔记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陆续发表一些。“摩尔根笔记”发表于1941年，“科瓦列夫斯基笔记”发表于1958—1962年间。到1972年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一书出版时，“梅恩笔记”和“拉伯克笔记”还未在苏联公开发表。而且，即使发表了“摩尔根笔记”和“科瓦列夫斯基笔记”，苏联的理论家们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这

^{*} 为行文方便，以上五个笔记在本书分别简称为“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拉伯克笔记”、“菲尔笔记”和“科瓦列夫斯基笔记”。

两个笔记的理论意义,更不可能把笔记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动向联系起来考察。出版“摩尔根笔记”,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出版“科瓦列夫斯基笔记”,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论》中有关地租的章节。在我国,其情况与苏联大致相同。虽然“摩尔根笔记”和“科瓦列夫斯基笔记”早就有单行本出版,但同样没有受到重视。

相比于上述情况,克拉德的贡献就大为不同了。他不是零散地或间断地,而是将马克思晚年几部重要的人类学笔记一下子推到读者面前,并作了详细的介绍和系统的研究。继1972年的《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一书之后,克拉德又相继发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马克思著作中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等著作,不仅将晚年马克思作为其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来研究,而且将笔记同马克思整个一生的思想历程联系起来考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人类学笔记的整理与发表,人们还发现以往被忽视了的马克思晚年有关俄国问题的几封书信和书信草稿富含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样,人们好像一下子看到了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新动向和新变化,也仿佛看到了一个不同于马克思中青年时代的“晚年马克思”。

二、对“晚年马克思”的研究

任何科学的研究领域都有着这样一个普遍现象:一个新的发现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一次新的研究热潮。

1932年,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西方世界首次全文发表。其后不久,就出现了一股“青年马克思”的研究热潮,并同时出现了“两个马克思”的观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将这部《手稿》同马克思后来的著作对立起来,认为《手

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启示录”，因为它集中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人道主义。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德曼在《手稿》发表的当年，就在他的《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写道：“马克思的任何一部其他著作，都不像这部著作这样清楚地展示出隐藏在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后面的人道主义主题”。他还说：“切不可高估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相反，这些著作暴露出他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这里的所谓“晚期著作”，不是我们前文所说的人类学笔记，而是指马克思在六十、七十年代所写的论著，尤以《资本论》为代表。在资产阶级学者们看来，《手稿》代表着马克思理论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马克思理论的真义所在，要认识和研究马克思，就必须“回到青年马克思”。

当1972年克拉德整理出版了马克思晚年几部重要的人类学笔记时，如同40年前《手稿》的出版一样，西方学术界随即涌出了一个“晚年马克思”的研究热潮。

克拉德本人是掀起这个热潮的第一人。他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两书的长篇序言中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所表明的是马克思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其早年思想的回归，具体说是回归到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哲学人类学。据此，克拉德将马克思的一生的哲学探索归结为从早年的哲学人类学到晚年的经验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并就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提出了他的方法论原则，即“必须把包含在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的晚期著作同他在四十年代的早期著作联系起来考虑”。^③

对于“晚年马克思”的研究，克拉德的观点在西方世界倡和者甚多。譬如，杜娜耶夫斯卡娅就是其中一位。虽然她主张“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同时又认为，在

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想象力中出现的^⑧新东西是,男人和女人们在资本主义以前社会中塑造他们历史的方式不断变化,多种多样,人类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多样性。马克思这十年经历了一次认识上的冲击,因为他研究了新的以经验为依据的人类学著作,看到了一些积极的特点,这些特点都和他最初与资本主义决裂并号召进行‘人类的革命’时曾经阐明的东西有着某些相似之处。”^⑨

美国人类学家诺曼·莱文考察马克思的晚年思想时,将恩格斯置于马克思的对立面。他在《悲剧性的欺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反对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辩证唯物主义和“村社”》等一系列论著中,坚持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而恩格斯却是一个“地道的”经济决定论者;恩格斯所做的,只是将马克思活生生的历史理论变成教条化的机械决定论模式,即认为只有社会的经济因素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世界历史也必然依循着经济规律而在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上发展。同时,莱文又认为,马克思晚年笔记相对于他在此之前的所有论著,富含着新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在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上,马克思晚年与中青年时代存在着许多“矛盾”乃至“对立”的现象。

美国另一位人类学家唐纳德·凯利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沿着由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到对人作实证的和科学的研究这样一条轨迹转变的。但是,“对于晚年马克思来说,最令人感兴趣的则是这样一种迹象,他似乎正在超越一种仅限于经济学和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晚年马克思”的理论价值也正在于它“对中年马克思相对狭窄的唯物主义的超越”。凯利称这种超越是马克思“修正马克思”,并说“马克思就是他自己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⑩而人类学研究,可以被视为马克

思为了“修正”他自己所进行的理论探索。

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毛里斯·戈德里埃、克劳德·梅雅苏、埃曼努伊尔·泰勒等人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笔记体现的是历史的“多元决定论”,而不再是他自己以往的“一元决定论”。这种“多元决定论”既体现在史前的社会中,又体现在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上。

不难看出,不管是把马克思的一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还是把马克思一生作阶段性考察,在西方学者们那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家形象相对于他的中青年时代,是独具风采的。为了确定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地位,西方学者大多把马克思一生作两阶段划分或作三阶段划分。在他们眼里,似乎有“两个马克思”或“三个马克思”。*“三个马克思”论者把马克思的一生划分为青年、中年、晚年三个阶段,认为晚年的马克思的思想实质上是超越或否定“中年马克思”从而向“青年马克思”的复归,复归的主题是哲学人类学,或曰“哲学人本学”和“人道主义”。“两个马克思”的论者把马克思的一生分为中青年和晚年两个阶段,认为晚年马克思的思想是对“中青年马克思”的修正,修正的主题是历史的多线论。具体说,是以历史发展的多线论修正他自己中青年时代的历史发展单线论。与1932年发表《1844年经济学

* 在对马克思早年《手稿》和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研究中,西方学术界都曾出现过“两个马克思”的说法,但其内涵却是大有区别的。前者说的是“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其中“青年马克思”指的是1848年以前的马克思,而“老年马克思”指的是1848年以后的马克思。由于当时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没有公开发表,所谓“老年马克思”事实上指的就是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资本论》写作这一段时期的马克思。而后者所谓的“两个马克思”则是以马克思晚年系统研究人类学划界,之前为“中青年马克思”,之后为“晚年马克思”。这一划分法亦为我国学术界所接受。